

东汉著名将领鹿邑人虞诩



■晚报记者 侯国防

鹿邑这块古老的土地，人杰地灵，英雄辈出。除了人们熟知的伟大思想家、哲学家、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外，还有一位文韬武略的东汉著名将领——尚书令虞诩。

虞诩，东汉陈国武平（鹿邑邱集乡武平城村）人，字升卿，东汉名将。历任太尉郎中、朝歌长、怀县令、武都太守、司隶校尉、尚书仆射、尚书令等职。虞诩战功卓著，为官清正廉明，是东汉著名军事家、政治家。他的事迹被载入史册（《后汉书·虞诩列传》），名垂千古。

任职朝歌

虞诩，生年不详，卒于公元137年。他出生于平民家庭，早年父母双亡，靠祖父母抚养长大。虞诩从小聪明懂事，好学上进。

俗话说，家贫出孝子。虞诩虽然学有所成，但看到日渐老迈的祖父母，他不忍外出做官，而是忠实地孝顺祖父母。虞诩在祖父母年近病重之时，终日守在床边，竭力尽孝，直至养老送终，又按习俗忠心守孝至期满。虞诩因孝成名，被本县县吏奉为孝孙。加上他有才学，被举荐为候选官职，后来被安排到太尉李修府中任郎中。这个差事虽算得上是个小官职，但地位卑微。

东汉时期，北方的匈奴已不是心腹大患，西北的羌人开始骚扰西北凉州。公元110年，东汉王朝面临南匈奴的叛乱和西羌的民变，军队节节败退，尤以西羌的进攻为患。那时西羌已经攻打到并州（今山西省太原市）和凉州（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），形势严峻。大将军邓骘想放弃凉州，对付北方的南匈奴。邓骘的提议不乏支持者。这个决议被虞诩知道后，他急忙去找自己辅佐的太尉李修，说：“公卿们定策放弃凉州，我觉得这恐怕是亡国的愚政。”李修就问他有什么看法。虞诩说：“先帝开拓疆

土，百战而后定，我们后世子孙怎么能轻言放弃呢？今困于军费，就放弃凉州重地，实在是浅薄之见。凉州一旦丢失，那三辅之地就是边塞了。富饶的关中平原就会战火连绵，连长安都会成为羌人铁骑随意出入。这是万万不可取的。”他又为李修讲了一番道理。

太尉进一步征询他的御敌之策，虞诩说：“今凉州骚动，人心不安。为了防止凉州由于动荡不安而发生变故，应该下令，从凉州的豪杰和官吏子弟中选拔人才到洛阳做官，这表面上看是表示朝廷对他们的恩赏嘉勉，实际上是拿他们作人质，以防非常之变，只要他们有抗战的决心，就足以消弥边患。”李修觉得虞诩的话很有道理，就在御前会议上转述了虞诩的见解，得到众公卿们的一致认同。大家依照虞诩的方案重新进行了部署，使凉州始终控制在东汉政府手中。

虞诩因此得罪了当朝权势显赫的邓氏兄弟。当时在位的安帝只有八岁，朝政由皇太后邓绥临朝，其兄邓骘辅政，邓氏四兄弟同时被封为万户侯，分别控制着东汉的要害部门和地区。三年前，当羌人刚起事时，邓骘曾亲率大军前往征伐，结果大败，后以贵戚得任大将军，专断朝政。虞诩一个小小的郎官竟敢推翻大将军的意见，叫他愤恨不已。

因保凉州提议有功，虞诩成了小有影响的人物。后来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一带发生农民起义，朝廷派虞诩出任朝歌长。虞诩受命，立即启程去见河内太守马陵。马陵对他说：“你是一位儒生，本应在朝中任职，怎么派你到那混乱的地区？”

虞诩答道：“既然是朝廷的官吏，怎么敢逃避祸患和灾难呢？朝歌是韩、魏郊野，背靠太行山，面临黄河，距敖仓只有百里的路程，那里的叛乱者不知道开仓招众，劫持库兵，守住城皋，看来他们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眼光和志向，不足为虑。只是目前叛乱者的士气正盛，不可与他交战，希望太守给以宽限，我自当有处理办法。”太守马陵答应了虞诩的要求。

虞诩就任后，第一个号令

就是招募勇士。他根据其品行把壮士分为三等：专行攻劫者为上等，好盗窃者为中等，不务正业者为下等，招到了一百多人。虞诩把这些有过之人召集到一起，先宣布免除其犯过的罪责，在酒足饭饱之后，让他们再回到造反者或盗贼之中，诱使他们出来攻掠和盗窃。虞诩命令军队埋伏于特定地点，当叛乱者被引诱到设伏地点之后，使叛乱者元气大伤，再不敢明目张胆地抢掠攻杀和盗窃了。虞诩平息了叛乱，使朝歌很快恢复平静。

巧退羌敌

公元115年，羌族叛乱，边疆告急，朝廷急需有才能懂军事的人才。西羌已开始进逼武都、汉中，但朝中诸将无人请缨。此时，邓太后想起了虞诩，她认为虞诩有将帅之才，于是立即把他提拔为武都太守。

在当时，武都已被羌兵所围，从京都洛阳到武都的路上处处都可能遇到羌兵的攻杀。这种形势下，只给头衔而不给兵将就让虞诩去赴任，无异于送他去死。

虞诩临危受命，带了随从官吏和少量的军队西出洛阳前去赴任了。进至陈仓（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部）境内的峭谷，遇到羌兵数千人截击。虞诩立即于阵前发布命令，停止前进，向朝廷请求援兵。此消息传到羌族那里，他们信以为真，抢了些东西就撤了回去，虞诩则乘虚通过峭谷。

行军路上，虞诩率军急走，每到一处安营造饭之时，虞诩即令部下多造一倍的灶坑，以使羌人以为汉军逐日增兵。此法果然奏效，羌人不知汉人增加了多少兵马，因此始终不敢近前。羌兵尽管一路尾追虞诩，但一直到虞诩进了武都城，也未敢袭击虞诩。事后，部下不解增灶之用意，前去询问。虞诩说，此乃孙臆增灶兵减灶的反用。孙臆增灶兵减灶是以示弱，我用兵不增而灶增，是使敌误以为武都派兵接应，因此，不敢犯我。到武都之后，虞诩清点兵马，汉军总数不过三千，而敌军却有万余人。虞诩立即改编汉军，招兵买马。他告示部卒每二十人可购一匹马代为劳役，并针对羌人多为骑兵的特点，迅速组建起万余人的骑兵队伍。

不久，虞诩在赤亭（今甘肃省成县西北）遇羌兵万余人的包围。虞诩决定消灭羌人主力，于是派人出城调兵埋伏于羌兵撤退必经之路。一切布置好之后，在羌兵试探性地进攻时，虞诩示弱以弱，用小弓射敌人，箭未及敌而落地。羌兵以为汉军弱小，于是放大了胆子往前冲。此时，虞诩发令，改用强弩射敌，而且二十弩为一组，同时射向一名敌人，这样，弩无虚发。羌兵遭此打击，怯惧顿生，表现出进退犹豫之状。虞诩当机立断，亲率军队杀出城外。羌兵大败，夺路而逃，汉军一路追杀，势不

可挡。羌兵在溃逃中已死伤大半，好不容易逃到黄河边，准备渡河逃跑时，汉军早已按虞诩的布置埋伏于此，伏兵乘羌兵半渡而击之，致使这股羌兵主力几乎全军覆灭。虞诩短时间内整顿了汉军，平息了羌人叛乱，使武都一带由战乱转入了和平安宁的环境。

刚正不阿

虞诩不仅通兵法、懂谋略、会治军，而且更熟悉政治。他明白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为百姓创造一种和平环境，而在和平环境下，就应该搞好地方治理，使民众安居乐业。在武都一带的武力威胁解除后，虞诩建筑营垒一百八十所，以保卫边境的安全。之后，虞诩筑建营垒积极备战，兴建水运。于是，武都在短短的三年内，物阜民丰，人口也由当初的一万户达到四万户。

在处理完军事大事之后，虞诩开始治理地方政务。他招还流亡百姓，劝其归耕；救济灾民，使其衣食有着；疏通开掘水渠，灌溉良田；开垦荒地，扩大耕种。虞诩治武都，获得了“边亭稳定，家人足，一郡大安”的结果。

虞诩每治一地必定政绩斐然。虞诩因政绩突出、才干过人，于公元126年被调任司隶校尉。这一官职的责任是执掌京师的察举大事。在朝政腐败、官官相护的复杂环境中，这一职是非常难干的差事。

虞诩面对困难，毫无惧色。就任短短几个月，他抓住朝臣的腐朽行为大开其刀。由于虞诩政绩突出，影响甚大，权贵势力对他无可奈何。

此后，虞诩升任督察百官。虞诩刚正不阿，对贪官大胆弹劾。朝廷因此罢免了太傅冯石、太尉刘喜、中常侍程璜等贪官。虞诩也因此得罪了权贵和宦官。中常侍张防等人诬陷虞诩入狱。但虞诩则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宁死不屈。由于汉顺帝深知虞诩的忠诚，并有浮阳侯孙程等人的大力营救，虞诩沉冤昭雪，被赦免出狱，并被委任尚书仆射要职，后又因兴利除弊，功在国家社稷，升任尚书令。虞诩一生九次被谴，三次受处刑罚，但仍刚正不阿，至死不屈。虞诩在战时不失为一代名将，担任朝中要职时也不失为一代名相。

据《水经注》载：涡水又东径武平县故城北。城之西南七里许有汉尚书令虞诩碑。碑题云“虞君之碑”。今碑已佚，墓东南五里为邱集，有碑曰“虞公故里”，今无存。

据此，虞诩当时死后葬于陈国武平（今鹿邑县邱集乡西南清水河西岸），当时的墓冢面积4500平方米，封土堆高5米，墓室呈“中”字型。上世纪90年代，文物考古部门出土有陶磨、陶盆、罐、壶、五铢钱等。墓前原有清代“汉尚书诩诩升卿虞公墓”碑，现存鹿邑县博物馆内。

中国当代姓氏观念的嬗变

□程俊松

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定势，姓是祖先所传，名是父母所授，名字不合心意，可以再取一个，而这个姓是不能更改的。然而，时代毕竟不同了，中国的姓氏制度自先秦发展到今天，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中国的姓氏已变得十分错综复杂。当代人的姓名结构已逐渐发生变化，出现了四个字以上的姓名，还出现了个别极端个性化的名字。

当代姓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在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下，传统的姓氏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。子承父姓的习俗已发生变化，子女可以从父姓，也可以从母姓，或以父母合姓作为名字，有的甚至另取一个新的姓。姓氏观念的变化有时会受政治气候、生存压力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。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，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同步前进。个性的张扬和多样化，使得传统姓氏观念的桎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新世纪以来离婚率不断攀升，单亲子女随母姓氏的越来越多，有的随母再婚后又随了继父的姓氏。

现代社会不论姓氏，不论性别，不论门第，不论家族，只有职务之分，而无尊卑之别。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的智慧才干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，与他姓什么，出身什么家庭，已失去必然的联系。姓氏仅对家庭具有意义，对整个社会来说意义并不大。姓氏已不再具有严格的固定性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姓氏，他人无权过问干涉。这在法律上已经得到确认。

“姓”“名”合一的趋势正在开始，这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体。有的作家、艺术家长期使用固定的笔名、艺名，而原名却被人们淡忘。李带甘笔名“巴金”，世人知道巴金的远比知道李带甘的人多，不少人以为他姓“巴”名“金”呢。启功先生，不姓启（姓爱新觉罗），而是名叫启功。不少年轻人都以为他姓“启”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姓氏观念还将继续发生变化。

第二，姓氏族群发展不平衡，大姓人口爆炸。

中国古今使用的汉字姓氏，多达两万多个。但由于数千年的历史演变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，古今大量姓氏已经废弃不用，由此造成我国姓氏在全民人口中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，表现为用字单调、大姓人口比例过高等现象。

我国目前使用的汉字姓氏约为3600个，而在汉民族中有87%的人仅用了100个常用姓氏，在19个大姓的人口占了汉族人口的55.6%。而在这19个姓氏中，居前三位的李、王、张三个“超级大姓”则占了汉族人口的22.4%。直到今天，仍有一些姓氏（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），也还在改从这些大姓。经过历史长期累积，这些姓氏的人口无疑将急剧增加。

第三，少数民族姓氏采用汉族姓氏已成一种普遍现象。

随着边疆建设的开发与民族文化的融合，少数民族新生代取汉字作为姓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。如今，已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少年的“姓名”形式与汉族无异，以至于本民族原先的姓名制度，在年轻一代身上不复存在。

姓氏文化 第29期

周口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
周口日报 周口晚报 主办